

上海市高校教育高地建设项目

翻译学词典编纂之 理论研究

A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 Compilation of
Translatology Dictionaries

曾东京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学词典编纂之理论研究 / 曾东京著.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 - 7 - 81118 - 074 - 9

I. 翻... II. 曾... III. 翻译—词典编纂法—研究
IV. H059 H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4286 号

责任编辑 傅玉芳

封面设计 孙 敏

技术编辑 金 鑫

翻译学词典编纂之理论研究

曾东京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 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句容市排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字数 208 千字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100

ISBN 978 - 7 - 81118 - 074 - 9 / H · 140 定价: 22.00 元

译学术语与翻译研究(代序)

方梦之

曾东京教授对词典的学术问题素有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起,他就在我国外语期刊上对各类英汉词典写评论、谈看法、建言献策。后来又根据词典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原理和方法进一步研究辞书——特别是英汉双语辞书——的各种问题,包括词条的描写性和规定性、编纂原则、体例、编排方法、内容、功能、索引以及检索系统等。涓涓细流,汇成大河。多年下来,曾东京教授在辞书方面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成果已蔚为大观。经系统整理,写就《翻译学词典编纂之理论研究》一书,将词典学与翻译研究结合,为我国译坛增添了独树一帜的专著。

我虽然编过英汉词典和译学词典,但对词典学竟懵懵懂懂,只是到了近两年随着我国学界的深入研究,才予以关注。这方面是应当向曾东京教授学习的。

下面从译学术语的角度来谈一谈翻译研究的走向,想来不无关系。

术语是某一特定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术语的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水平往往代表一门学科的发展水平。译学术语是构建译学体系的要素,是译学研究走向的一面镜子。近半个世纪以来,系统的、科学的现代翻译理论研究从无到有、拔地而起,完全可以从术语的积累过程和术语的建设中看出端倪。现在可以掷地有

声地说,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确立起来了,因为已经有一整套术语可以用来描述其研究对象、目的、方法、规律和定理的基本概念和术语。

一、概念、术语与学科

学科要上去,首先是基本概念要科学化、系统化。“自然科学的成果是概念。”“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总结也是概念,每一门科学都有它使用的基本概念(也称范畴)。”(列宁语)

术语是一种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语言符号。术语的意义必须以明确定义的科学概念为基础,具有单一的理性意义和感性色彩,它是描述和传播科学概念、定义和规律的基本要素,也是促进学科建设的有力工具。术语建设是任何成熟学科必经之路,译学的发展也正是这样,前人的学术思想通过一系列术语代代相传。我们吸收和借鉴前人的学术成果,同时也就理解和接受了一系列的术语。“信”、“达”、“雅”、“原本”、“译本”、“口译”、“笔译”、“忠实”、“通顺”等术语流传到现代,内涵未变,基本概念依旧。

术语与概念唇齿相依。在科学研究中术语由概念而生,反过来术语又用于描述和传播科学概念。

术语与概念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术语在谈话者双方的心目中产生的印象是相同的。在科学研究中,新的概念一旦形成,表达这一概念的术语也就可能同时形成。概念相同,术语也应该相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在表述“原语形式肯定,译语否定;或者原语形式否定,译语肯定”这样的翻译技巧时,竟发现有十余种说法,诸如反面着笔法,反译法,同义反译法,语义反述法,正反、反正表达法,正说反译、反说正译,反译,正说与反说,反正,用反语,正反译法,反面着墨,正反译,反说,反义表达法等。不愧是搞翻译的,在“正”、“反”、“译”、“法”等寥寥几个字之间颠来倒去,竟能异曲同工。对于国外语言学中的一些术语,常见有译法不同者。论者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不加选择地引用,如把语言学上的术语分歧带进翻译研究,

M. A. K. Halliday 语言三功能的汉译术语多有不同: ideational function 意念功能、概念功能、达意功能; interpersonal function 交际功能、人际功能、人际关系功能; textual function 语段功能、组篇功能、篇章功能、语篇功能; 等等。

也有相反的情况: 同一术语,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概念。历史上曾有过“直译”、“意译”的无谓之争, 其中有的就是因为概念界定不明造成的。有人认为直译就是形式相同的词对词的翻译或称逐字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 有人则认为, 形式和内容都一致, 且读来通顺才算是直译; 而周建人走得更远, 他自称“向来用直译”, 把类似 lying on his back 这样的短语译作“仰卧着”(周建人,《陀螺序》)也算是直译。可见当时“直译”代表的概念一头是专讲形式的死译, 另一头是不讲形式的意译, 同一术语概念差距之大, 使直译意译之争不可能找到汇合点。又如, 前几年, 我国外语期刊上有过一场对“翻译单位”的争论。有人以为翻译单位就是翻译转换过程中的操作单位, 认定句子是基本翻译单位。有人则把翻译单位当作结构单位, 认为要以语段为翻译单位, 因为“在高于句子的层次上进行翻译, 可以不拘泥于原文的句次和句型, 可以按照译文的语篇结构习惯, 重新组织和调整”。有人又把翻译单位看成是理解单位, 认为句子或语段作翻译单位并不可取, 理由是: “篇章之所以不失为一个比较理想的翻译单位是因为它拥有一个较大的舞台——语境。”翻译单位这一术语系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引自国外, 虽然国外在翻译单位的切分上有语段切分法、语义切分法、逻辑切分法等多种, 但这一术语包含的基本概念是同一的, 一般应尊重首创这一术语者所给予的定义。术语和它代表的概念应该是一致的, 术语定义的分歧必然带来学术思想的分歧, 甚至混乱。

二、译学术语的产生

译学的研究领域愈来愈扩大, 对本体的研究也愈来愈精细化, 新思想、新概念、新方法不断产生, 于是, 大批新术语应运而生。术语产

生的方式不外乎新词新义、旧词新义、旧词搭配生新意,再是从相关学科借词取义。

(1) 新词新义: diasporic translator 现被翻译成“离散译者”,恐怕难予接受。原来 diasporic 是 diaspora 的形容词,可能来源于人类学,意为“移民社群”。这里意义为“有源语国家生活背景的并了解该国文化的(译者)”,所以一定的语境下 diasporic translator 译为“海归译者”或许比“离散译者”更贴切(但“海归”一词有局限性,它仅指海外归来,而不包含从我国内陆接壤的国家归来的意思)。有一批随着新技术的应用而吸纳的新词,如后编辑(post-editing)、预编辑(pre-editing)、网上机器翻译(on-line machine translation)、翻译记忆(translation memory)等。

(2) 旧词新义: 现在语言学派中 useful critical linguistics 进行翻译研究的,这 critic 一词我们再熟悉不过了,常常表示指出优缺点、评论好坏或专门指出缺点。但是, critical linguistics 中的 critical 完全不是这回事。这里,批评是指揭示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critical linguistics 是通过分析语篇的语言特点和它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来考察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并进而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Lefevere 的 rewriting(“改写”)不是随便地拿一份材料来改一改、写一写。他的“改写”是一种文体样式,包括翻译、阐释、评论、编选论文集等,这种改写要受到目的语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制约。

(3) 旧词搭配生新意: 如 translation universals 为“翻译共性”或“翻译普遍性”,是指翻译语言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语言,相对于源语语言或目标语原创语言整体上表现出来的一些规律性的语言特征,或是指译文中呈现的有别于原文的一些典型的、跨语言的、有一定普遍性的特征。这些特征概括为译文的简化(simplification)、显化(explicitation)和范化(normalization)。这一术语随着近些年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兴起而多见于有关论作。

(4) 学科交叉生新词: 如以 20 世纪 90 年代末国外热衷于研究

的翻译伦理学(translation ethics)为例。伦理与翻译结合,一批新词加入进来。什么翻译的“再现伦理”、“服务伦理”、“交际伦理”、“规范伦理”,等等。翻译的再现伦理回溯到翻译忠实的理想状态以及神圣译本的翻译,要求准确地再现原作及原作者的意图,做到不增不减不改。翻译的服务伦理将翻译视为一种商业服务,要求翻译最终要符合客户要求,实现由委托人与译者共同商定的目标。翻译的交际伦理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而不是对他者文化的描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在于合作互利;翻译的交际伦理目标是促使双方跨文化合作,译者应忠实于自己的职守。翻译的规范伦理得益于描述性翻译研究和规范理论:译语文化中的规范代表了当时译语文化对于译作的期待,译者道德是符合规范,满足特定文化的期待。此外如翻译心理学、翻译修辞学、翻译哲学等都一批批地产生新词。

三、译学术语的发展

术语是一门独立学科的集中体现,译学各阶段的重大进展必然以术语的形式反映出来。这里我们分几个阶段来说。

(1)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也就是在翻译的语言学研究之前,能够充分反映翻译理论概念的术语贫乏,常用的如直译、意译、原本、译本、忠实、通顺、作者、译者、信、达、雅等,屈指可数。浏览一下罗新璋编的《翻译论集》,在一百多篇文章中,光以“(浅)论翻译”、“(浅)谈翻译”、“翻译漫谈”、“漫谈翻译”、“关于翻译”这样的标题就有 16 条之多。翻译大家们写的文章,有的为有感而发,有的为经验之谈,大多有明确的主题,采用如此笼统的标题,在翻译术语乏然可陈的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现在,如果有哪位作者写文章再用这样泛泛的、大而无当的标题,向任何的期刊编辑部投稿,我想都是难以被接受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找到以明确定义的科学概念为基础的术语,来表达翻译研究的某个方面观点,用确当的术语来点明主题。

(2) 五六十年代到 80 年代初期,我国的翻译研究以随感式、印

象式、经验式的微观研究为主。但是,当时我国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兴起。我们在翻译的语言分析中引进了整套整套的术语,特别是语法术语。张培基等 1980 年编著的《英汉翻译教程》更是以英汉语言对比为主线,系统地总结和整理了英译汉常用的方法和技巧,从词义的选择、引申和褒贬,词类转换、增词、重复、省略、正反译法、分句合句、被动态译法、从句译法直到长句译法,把传统语法中的词法和句法合理对应。这时从语言学引进了一些重要术语。其中包括像“转换”(transformation)这样的关键术语。转换原来在语言学中的意思是:按照一定的规则,用重新安排结构成分的次序、添加或省略某些成分等手段,把一个语言结构或几个语言结构改变成另一个语言结构的过程或结果。翻译研究把原来发生在同一语言中的这种结构转换改变成发生在不同语言中的各种转换,而且把它的外延进一步扩大,可以是语音转换、意义转换或修辞形式转换(不一定是结构转换)。接着,在翻译研究中,光“转换”一词就派生出许多术语,例如句型转换、层次转换、级转换、词类转换、语态转换、辞格转换、视点转换、形象转换、信息转换、语义转换……说不完的转换。仅从“转换”这样一个词就可见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重大贡献,更不用说从语法学、词汇学和普通语言学以及后来从篇章语言学、功能语言学汲取的整套术语。

(3) 80 年代中后期以后,许多交叉学科的术语闯入了翻译研究的领域。翻译术语又迅速壮大起来,信息论中的“信息(information)”一词及其派生的许多术语,如冗余信息、交际信息、语篇信息、信息载体、信息传递等;思维科学中的“模式(model)”一词,并由此而派生的许多术语,如语义模式、功能模式、转换模式、语义—认知模式等;哲学中的“主体(性)”、“客体”、“范畴”、“方法论”等等。

(4) 90 年代后期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又有一小批像“文化翻译”、“文化意象”、“文化适应”、“文化误读”、“文化移植”等术语进入翻译研究。

这样,译学的术语经过不同阶段的积累,逐渐丰满起来,并且形成了体系。这从一个方面证明,翻译学确实建立起来了。

四、术语与译学体系

任何学科要取得独立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要有一个定义清晰的、结构严谨的术语的体系和一个稳定的知识系统。有这样一个例子,1985年,在编撰《中国民俗词典》时,国内民俗研究方兴未艾,但并未形成和建立学科体系,该词典将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分类编排,从而建立起了民俗学的学科架构(赵巍,2005)。

术语的积累与译学的发展是同步的。译学发展到什么程度。术语体系也随之完善到什么程度。我曾撰文认为,译学发展过程所形成的体系和层次大致可分为“一体三环”。一体就是译学本体,本体的术语,例如直译、意译、神似、化境、翻译单位、翻译标准、信达雅、可译、不可译、异化、归化之类的,是自古至今长期孕育产生的,是译学不可动摇的基础。紧靠着本体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构筑起来的一环,语言学给翻译研究带来整批的术语,如语篇、语域、连贯、衔接、语用、话语、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对比分析等等。这些术语虽然没有进入译学本体,但是它们跟本体的关系最为密切。运用语言学的整套术语和方法,使翻译研究从感性走到理性,从经验走向科学。七八十年代,哲学、思维科学、心理学、信息论、交际学、符号学等相关学科参与了翻译研究,在本体之外又形成了新的一环。例如,哲学中的范畴、本体论、一元、二元、多元,思维科学中的模式、同构、先结构等,心理学中的认知、再现、意象等,信息论中的编码、解码、代码、冗余等。各交叉学科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术语也是相当可观的。众多的交叉学科使译学研究从单一的语言学途径走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向综合性学科过渡。离本体最远的一环就是文化,翻译的文化研究是90年代兴旺起来的。它的意义在于把翻译研究跟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全面地联系起来,从而使翻译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

综合研究。

总的说来,目前译学术语已蔚为大观,但释义、理据及至体系远非充分或完整。有些基本术语各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翻译”一词,任何一本翻译教材或一篇论文都可以给它下一个自圆其说的定义。translation studies 和 translatology 的意蕴及其作为学科名称尚有争议。术语中一词多义或多词同义的现象司空见惯,这些都有违于术语的科学性、单一性或简明性,预示着翻译学科的建设将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五、从术语体系看译学研究趋势

拙编《译学辞典》所收术语的数量来看,译学本体术语占半,语言学各分支及交叉学科加起来不到半数。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虽然势头不小,但比起语言学和多学科这两环来,它带来的术语要少多了。因为像意识形态、权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词汇本来就不是文化专用词。将意识形态、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引入翻译研究的最大好处是我们多了一个新的、有效的研究视角。可以让我们将研究焦点从文本内转向文本外,从注重忠实原文转向探讨译文的变形,从语言对比研究转向翻译文化研究”(蒋骁华,2003)。文化转向带来的影响更多的是思想观念、政治立场、研究视角、研究倾向上的,而不都是学术概念本身的,所以它对译学术语的建设贡献有限。拙编《译学辞典》所收的有关文化的术语比较少。最近郭建中教授根据文化学作过有关翻译的文化词条的统计研究,结果发现与翻译密切相关的文化词条也不足100条。而且其中有的本来就存在,不是文化转向以后带来的。所以从术语的产生的角度来看,由文化转向而产出的有限。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翻译学这部车在‘文化转向’后又慢了下来”,理由之一是它没有给翻译研究带来更多的新概念、新术语。或许可以这样说,文化转向从文化学给翻译研究带来一小批新的术语。

翻译的文化转向,其学术基础是文化学(cultural studies)。文化

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确立的,它的历史并不比翻译学的历史长多少。在文化研究中,“文化”一词的定义多达 150 余种,跟翻译研究中的“翻译”一样各说纷纭。同样,文化学也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文化转向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思想、新视角对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翻译研究者要关注文化学的发展,特别要关注其新的重要概念的形成和相关术语的产生。

不管文化学派对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如何排斥,语言学对译学的贡献是最根本的,可以这样说,脱离相关的语言学术语,现在我们根本无法讨论翻译问题。“有些学者虽然公开表示自己不属于语言学派,并从各个角度提出批评,但是一旦开始作描述性研究或讨论教学问题,他们就不由自主地要大量采用语言学分析工具。……比如,已故的 Andre Lefevere 就曾直言不讳地批评语言学途径,但在他自己的著作里,广泛使用了诸如言内之力和言外之力等主流语言学概念。”(贝克,2005)

语言学从没听停止过发展,从五六十年代的词法句法到 70 年代以后的篇章语言学、交际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到 90 年代的批评语言学,从语篇分析到语境转向,翻译研究的语言学途径借鉴语言学的发展在不断地发展。另一方面,众多交叉学科对翻译研究术语体系的贡献也是面广量大的,跟一门学科的交叉意味着一批术语的产生,例如,与伦理学交叉就有一批伦理学的基础术语与翻译概念结合起来,与社会学交叉就有一批社会学的基本术语与翻译概念结合起来。……所以,从译学新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来说,翻译研究与不断发展的当代语言学相结合,以及与已有的或新的交叉学科相结合,这两方面过去是、今后仍然是译学新概念和新术语的重要的生长点。

参考文献:

[1] 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中国翻译》2003 年第 5 期。

[2] 赵巍:《译学词典分类编排的认知心理学理据及设想》,孙迎春:《2004 翻译学词典与译学理论问题》,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3] 莫娜·贝克:《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模式与方法》,《外语研究》2005 年第 3 期。

前言

.....

本人接触翻译学词典是林煌天先生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A Companion for Chinese Translators*)(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出版的第二年,即1998年。当时因热衷于翻译理论与实践,就如获至宝般地买了一本,但也只是把它当作一般的翻译词典看待,需要时查阅一下。尔后,接触了方梦之先生主编的《译学辞典》(*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至于孙迎春教授主编的《译学大词典》(*Aspects of Translation*)(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年版),承蒙其赠书一册才得以拜读。随后又学习了国内外的一些译学著作,如 Mark Shuttleworth and Moira Cowie 的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t. Jerome Publishing, 1977), Mona Baker 的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Routledge, 1998), 香港陈善伟先生主编的译学词典与手册等。

真正把翻译词典当作翻译学词典对待的是在2004年山东烟台召开的“第二届全国译学词典与翻译理论研讨会”上,尝试着写了一篇论译学词典编纂的短文,发表在会议论文集上。同年,写了一篇《译学辞典》的评论文章,发表在《上海科技翻译》上。之后,就对翻译学词典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外加双语词典研究在国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自己也有点激流勇退,另辟蹊径的想法。何况翻译学词典跟词典学也有着莫大的关系,并热情地投身于2005年在上海大学召开的“全国第三届译学词典与翻译理论研讨会”的筹备、主办、主持、主编会议论文集“2005译学词典与翻译理论”专辑的工作中去。通过多次的对外交流,更扩大了译学词典研究的视野。

通过数年的研究与探讨,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我们发现在翻译学词典研究领域,中国人竟然略胜西洋人一筹,不论是理论研究

而或词典编纂方面莫不如此。要知道,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研究方面,国人都是在西人后面跟进,走了一条学习、消化、吸收、草创的道路,难得有所突破与创新。所以,此发现激发了我们——我、我的同事与我的研究生们,进一步系统地研究译学词典编纂理论的热情,为译学词典研究作些积极的、力所能及的努力。

在这过程中,我们认识到:就翻译学词典而论翻译学词典这条路难以走久走远。因而,从宏观上来看,既要研究传统翻译本体,也要研究当代西方译学,还要研究中国的重实践的新译学,更要研究与译学相交、相关、相连的种种其他学科。从中观上来看,要研究翻译的历史、理论、实践、术语、分类、批评、教学、专名等等。从微观上来看,要研究每个译学词条(目)的5个w(即 who, what, when, where, why)与1个h(即 how),要从翻译学词典编纂的方针、原则、读者、体例、内容、术语、编排、功能、索引、附录等方面来落实,并自始至终地贯彻理论研究结合国内外实践探讨的精神。

本专著内容由第一章总论、第二章分论、第三章评论与第四章结论几个部分组成。第一章是针对相对全面性的理论问题探讨。第二章侧重翻译学词典编纂涉及的各个分支问题的论述。第三章是对八部译学词典与翻译词典的评论。第四章则总结了当前译学词典研究的现状与翻译学词典的分类,分析了存在不同程度问题之主观与客观的原因,指出了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与做法。

鉴于翻译学词典研究处于草创时期,外加本人的学识未必丰饶,研究功力未必深厚,研究方法未必全部对头,本作中的错误难免挂一漏万,敬希读者诸君提出宝贵的意见与建议,使我们能在这条崎岖的山道上走得更长、更久、更远,则不胜感激。

在成书过程中受到上海大学外语学院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上海市高校教育高地建设项目”的资助,获得《上海翻译》主编方梦之先生的鼓舞,且慨然为本书作序,在此特表诚挚的谢意。此外,承蒙上海大学出版社的青睐与责任编辑的工作,为本书增色不少,我要表达自己的谢忱。还有凭借我夫人黄国荣女士的大力协作,使该书得以按时脱稿,使我感激不尽。另外,我要感谢我的研究生周小微、苏珊与丁青在成书过程中做过的大量打印、校对与审稿工作。最后,我要感激曾与我合作过的卜爱萍副教授、钱文伟讲师与硕士研究生卢玉霞、苏珊、王新朋、沈燕与丁青等。

著 者

2006年12月31日于锦龙苑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1
第一节 翻译·翻译学·翻译学词典	7
第二节 从词典学角度看译学词典的编纂	17
第三节 论翻译学词典的范畴、概念与术语	32
第四节 关于《中国翻译学大辞典》的编纂提纲	41
第五节 一些译学术语翻译之商榷	57
第六节 论译学术语词典的规范性	68
第二章 分论	76
第一节 论翻译学词典的描写性与规定性	76
第二节 论翻译学词典的编纂原则	89
第三节 论翻译学词典的体例	99
第四节 论翻译学词典的编排方法	106
第五节 论翻译学词典的读者对象	115
第六节 论翻译学词典的内容	119
第七节 论翻译学词典的功能	127

第八节	论翻译学词典的附录	136
第九节	论翻译学词典的索引	147
第十节	论翻译学词典的检索系统	156
第三章	评论	165
第一节	《中国翻译词典》得失论	165
第二节	《译学大词典》纵横论	175
第三节	《译学辞典》的三大亮点	184
第四节	《翻译研究百科全书》的特色与不足	192
第五节	评《翻译学词典》	200
第六节	《史氏汉英翻译大词典》的四大特色	206
第七节	《汉语熟语英译词典》的特色	219
第八节	评《英语谚语大词典》的收译	225
第四章	结论	233
	主要参考文献	236

第一章

总 论

中国人对外国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研究基本上是走了这么一条道路：引进、消化、利用。换言之，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跟在外国人后面进行的，难得有所突破与创新。

而唯一令人感到自豪的是：翻译学词典的理论与编纂实践却不遑让西人。首先，国内外对翻译学词典的研究几乎是同时起步的，均起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其次，国外的翻译学词典仅见马克与莫依拉(1997)和莫纳·培克(2000)的两部，而国内却有林煌天(1997)、孙迎春(1999)与方梦之(2004)为代表的十余部，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再次，词典的规模与篇幅方面，林煌天词典不是西人所能望其项背的。第四，全国翻译学词典研究的会议已召开了三届(2002 年烟台会议，2004 年威海会议，2005 年上海会议)，第四届会议即将在辽宁省大连市(2007 年 4 月)举行，而国外未见此类会议的报道。第五，国内的翻译学词典的理论研究已有了一定的气候，出了三本会议论文集与一部博士论文集，并发表了一批有关论文，这是更胜西人的一个亮点。第六，翻译学词典专业委员会已正式挂靠在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委员会下，成了一个正式的群众性学术团体，这也为国外所无。第七，国内已有人对翻译学词典进行系统、全面的理论研究，国外亦无类似报道与传闻。

一言以蔽之，这个领域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领域(不比西人起步晚)，也是一个大有创新的领域(因无任何现成的经验与教训可资借